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文化发展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文化人的精神品格，他们的追求，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各不同社会阶层共同组成的，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在社会整体中占据有怎样的地位，还要看他们对于社会整体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他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能够起到的这种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文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群体意识，就把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自从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以来,他们在精神上的独特追求，首先就表现在他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虽然从来都不是社会统治者，却有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强烈的使命感。文人们有兼济天下的自觉意识，这使得他们总是试图帮助统治者管理好这个社会。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他们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体，都经常地遭到统治者的遗弃甚至迫害。在这种场合，在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这一神圣责任。在这种时候，他们依然能够表现出作为文人的特殊品格，独善其身。

文臣个个可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正是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北京时，兵临城下，皇帝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可惜满朝文武面对这一无可挽回的颓势，只能与崇祯皇帝一同相对而泣，束手无策。这时，崇祯在自己面前的御案上信笔写道：“文臣个个可杀”，给亲近的太监看了一眼后随即抹去。就在这两天之后，北京宣武门的守门太监王相尧领内丁千人开门迎接李自成大军入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杀，明朝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崇祯皇帝是被李自成的大军打败的，但是他并不责备那些率军打仗的武将；崇祯皇帝日常事务都听命于内侍太监，但是国家将亡时，他的心腹话仍然只对太监说。奇怪吗？说奇怪也不奇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管文人们在主观上是怎样

想的，也不管历代统治者在口头上是怎样说的，文人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始终令人捉摸不透。大约是从宋太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防止武将们拥兵自重，而夺去了曾经帮助他打下江山的武将们的兵权时起，中国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文治的社会。但是文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文人成了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实际上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在战乱频仍的时代，有了人才似乎就有了地盘，所以人才始终受到特殊的重视，因而从先秦时代一直到唐，文化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是很高的；而到了武将的权力受到抑止的宋代，身居高位的文臣究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究竟文臣们是否义不容辞地填补上了武将失宠以后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或者说，文人们是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自己像劳苦功高的武将们那样遭到毁灭的厄运的，确实令人深思。

我们可以看崇祯皇帝的一生中遇到过的几个典型的文臣，他们堪称中国历代文臣中罕见的大活宝。

崇祯曾经非常尊敬一位名叫周延儒的文臣。他甚至曾经不惜以九五之尊而屈节向周延儒行大礼，说“朕以天下听先生”。不想这位周延儒却是一个庸庸碌碌之辈。非但庸碌无能，而且生性贪婪。时值李自成和张献忠破河南楚蜀，天下大乱，这位崇祯要“以天下听之”的周延儒却一无所谋。其后，清兵入侵山东，又一次给明朝朝野以极大震动。周延儒这次再也不好意思坐视，不得已主动请求去前线视察讨寇大军。崇祯大喜过望，对周寄予厚望，不想周到了前线以后，却不敢与清兵接仗，只是整天里与幕僚们饮酒作乐，只留下一点功夫写上几张捷报，向崇祯谎报喜讯。

周道登也是曾经深受崇祯宠信的文臣之一。但是某天崇

祯问他为什么宰相要用读书人做时，他竟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一句话把崇祯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又一次,崇祯问道:“近日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一下不但崇祯忍不住，连内侍们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有这样的文臣，也难怪崇祯皇帝要把亡国的罪过推到文人们身上，认为“文臣个个可杀”了。可是反过来想，这些文臣难道不都是崇祯自己提拔到身边来的吗？毕竟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阶层的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皇帝选择怎样的人来担任他政府中的要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文人们要用怎样的方法来适应帝王，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个政府中的文臣都显得无能，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考虑这个政府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是否出了问题。不过皇帝从来就没有责备和检讨自己的习惯和规矩，所以国家有难，首先应该责备的，当然是臣下了。

其实细细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根子决不在于文臣的无能。明朝的文臣们确实是无能的，明亡以后，士人们曾经有过“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一死报君恩”的感慨，这两句话可以说是这些除了忠诚以外一无所能的大臣的生动写照。从文人们自己的角度上说，他们以传统的方式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但是这种道德上的要求并没有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几乎是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们只要求自己有一颗对于民族和皇室的忠诚之心，却忽视了这种忠诚如果没有处理实际工作的能力作为它的依托，单纯的忠诚对民族和国家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但是毕竟文臣也只是无能，而且无能还知道内疚，比起一见时势不对就打开城门迎接李闯王的

内侍们，其精神境界还是不可比拟的。这种精神境界上的差距充分体现了文人在精神上的价值，可是它仍然不能代替治理国家的实际才能。当然，不是说明朝的灭亡都应该归罪于文人。明朝最终灭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明朝初年就已播下了最终灭亡的种子，而这个种子仍然与文人有关，它就是皇帝对文人无端的猜忌和严厉的防范。

明太祖是以武力打败了蒙古人而取得了全国政权的，但是在马上得天下的明太祖却也懂得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也曾延聘了当时饱学的儒者宋濂作为太子的教师，但是他对于文人的任用，很快就归于厌倦。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明初的“空印案”。明代初年，各地的地方官员在向中央运送贡品时，一直采取随身带上盖好铃印的申报表格的办法，因为在向京都运送钱粮时，路上难免会有损耗，带上空白表格，就可以等贡品运抵京都时，再按实际可以送呈的数额填写表格，以免出现差额。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反感，因为这种办法无疑会给押送人在路途中贪污大开方便之门。明太祖下令严禁使用空印，甚至把所有已知与“空印案”有关的官员全部处死。但是不久，由于天象发生异兆，明太祖担心是否因为在“空印案”中对官员们的处置太过粗暴，于是下诏于天下征求直谏。当时在山西供职的一个名叫叶伯巨的文人果真上书，诚恳地向明太祖指出天下文人都把没有被皇帝召去做官作为一件幸运事，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确知自己的努力和忠诚非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光辉前景，反而会惹上麻烦。叶伯巨也以“空印案”为例，认为皇帝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过分不近人情。当皇帝读到叶伯巨响应他的呼吁写上的奏章时， 不禁大怒，下令用枷锁把叶伯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押解到南京，投入大牢。另一位就“空印案”上书皇帝的学者郑士钊也遭到了同样的回报，他指出某些地方官员使用盖有空印的表格，是因为他们地处边远，确属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皇帝原先并没有禁止空印的法令，也就不能责怪执行者。郑士钊因此而被流放。这就是说，尽管皇帝有时会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意，他却决不允许文人们批评，哪怕这批评是出于他自己的要求。

明太祖和中国古代许多皇帝一样，对文人的猜疑和防范总是有增无已。因为他怀疑文官们已经组成一个小团伙试图夺取政权，他下令解散了中书省，同时也诛杀了一大批文官。这次大规模的清洗所牵扯到的官员很可能达到 15000 之多，而在此同时，朱元璋还编撰了一系列钦定的官员守则之类的书籍，作为文官们必须遵守的戒律。他下令建立专门从事谏劝自己的谏院，但是不久又将它解散了。实际上到后来，精力充沛的明太祖自己已经兼任了从皇帝到一般大臣的所有职责，协助他治理国家的只有一批太监和专门负责在官员中开展特务活动的监察御史；而他的亲信中唯一有点学识的国子监祭酒李文忠，最后也被怀疑对他不忠诚而被砍了头。用所有可能用的残酷手段来对付被怀疑有二心的文人，大臣们动辄受到莫须有的株连，所以，尽管明太祖曾经下令全国普遍开展祭祀孔子的活动，并且自己也作出读书人的样子，去国子监讲《尚书》三篇，在明朝初年很长的一段时期，哪怕明太祖也曾多次发布命令要各地推举人才，文人们仍然还是都不敢出来做官。不仅明朝初年，在整个明朝，文人们参政都有某种生命危险，即使他再不问世事，大祸也许哪天就会降临头顶；万一他真的相信了皇帝要他提批评建议的话，那么

脖子上的脑袋也就不一定保得住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亡，而到了李闯王的大军和清兵两面夹攻之时，朝廷中所剩下的，也只有“个个可杀”的文臣了。

文人的这种命运在中国 2000 年封建社会中经常可以找到例证。虽然历代文人总是千篇一律地自称“文死谏，武死战”是作为人臣的义务，是大臣们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但是由于皇帝，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有雄才大略的帝王都很难真正容忍文人们的直言劝谏，由于放言直谏的文臣常常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皇帝一方，固然知道提拔任用听话的大臣更有利于他自己的统治，而长此以往，文人们在坚持要以自己的才学为天下苍生所用之余，也不免要想到这样做的后果。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文人为什么要读书？都说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面对一个满怀猜忌的皇帝，这“千钟粟”和“黄金屋”也就可能是一个陷阱。这样的社会现象逼得文人们要从多种角度去认识知识的价值，那就是，知道除了可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可以使自己获得功名利禄之外，还可能有更内在的价值。

达则兼济天下

宋代文人郭昱中了进士，但是他不愿意像一般的进士那样得到一个普通的官职。于是他就给当时的宰相赵普写了一封信，自比巢父、许由。赵普把他这封信带到朝廷上读给大家听，满朝文武都很厌恶这种矫情的激奋之辞，似乎那些已经担任各种职务的大臣都不如他那么清高。所以他们有意很

长时间都不给他安排任职。郭昱终于忍耐不住，就趁赵普外出时遥遥拜倒在赵普必经之路以等候他的到来。事后，赵普笑着对别人说，我今天真是幸运，能够有幸让巢父和许由拜倒在我的马前。郭昱的举动确实有可笑之处，但是这种可笑是郭昱以超然世外不愿从政的巢父、许由自居，实际上很快就改变了他的初衷，露出了从政的急切心情。文人从政并不可笑，想做大官也未必就可笑。说到底也只有身居要职的文人才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为天下做一些好事。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文化人就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发达程度是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所谓文化人，也因为他们作为文化的载体，而成为文明社会中特别受到人们尊重的群体。

但是文人之所以受到文明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因为有文化而具备的特殊的能力。人格上的力量，始终是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受到怎样的评价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哪怕是在文化遭到最严厉的毁灭性打击的时代，文人阶层都受到其它任何社会阶层都不曾拥有的尊敬甚至崇拜，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人们从整体上说，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能够比普通人有更好的修养，胸怀更加宽敞，而且更关心整个国家、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可以因为创造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流名千古，但是他们在道德领域中的操行如何，则被视为评价他们的人格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一个优秀的、为世人所敬仰的文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就是说，他应该是时刻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他不应该为一己获得的私利而喜而悲，对个人得失淡然处之。在他有机会担任地位显赫的高官时，他应该时时想到百姓的疾苦，惟恐人民受饥寒；在他没有能在国家的治理核心层任职，在远离国家权力中心时，他也应该时时为君王而忧虑，惟恐帝王有过失。于是，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有值得忧虑的情况出现时，他就开始为之忧虑了；而只有在天下人都已经得到了快乐时，他才欣欣然感到快乐。范仲淹本人并不能说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高风亮节的圣贤，但是他的这番话，却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甘心为天下忧的精神传神的写照。

南宋末年的进士文天祥也是一个后人经常提及的有文才的英雄。文天祥曾经担任南宋与大举南下的元军议和的使君，宋亡后他拥立九岁的广王，在福州建立起小朝廷。他自诉“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把他从使北直到南行的经历用诗歌记了下来，并命名为《指南录》，在这本书的后序中他感慨地说：“予生也有幸，而幸生也何所为？……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在国难当头时，文人们往往能够以文化主人翁的责任感，主动地担负起本来不应该由他们担负的责任，而像文天祥的自诉，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一片拳拳爱国之心，却溢于言表。至少他在考虑自己的生存意义时，坚持认为作为一个文人，活

着不仅仅是为了像一只动物那样活着，而且还应该明白大义之所在，也就是应该有为国家为民族而舍身的理想；而明白大义之所在又是为了要在实际的人生历程中实践这一理想。

在文人们忧国忧民的心中，满怀着对生民的同情与爱心。一种对整个人类，整个民族的，尤其是对于下层人民的命运的关怀。固然，古代文人在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忧虑中，也不无对于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统治者的忠诚，这种忠诚有时可以表现得相当愚昧，但是由于文人们，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文人们的忧国忧民之心，在许多场合都是从他们对下层民众的苦难，从他们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波折的深切体验出发的，所以，他们这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痴心经常会远远超出了对皇帝个人的顺从和忠诚，而表现为宽广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杜甫在诗歌中就经常表达他的这种心境，他的诗中不断出现如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谁能叩君门，下令减赋税”“几时高议排金门，长使苍生有环堵”这样的句子，而在他的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触发他灵感的是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但是他笔下所写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也就是这个杜甫，自己的儿子饿死了，心中感慨的却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杜甫也许有些矫情，但是哪怕确实有矫情之嫌，也足以令人感怀。这种人道主义的胸怀与他们的文化修养不能分开，与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不能分开；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孟子所说的文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在为人处世时，应该怀有超

乎一己得失的精神境界。更广义地说，它意味着文人应有的一种社会责任心，以天下苍生的幸福为自己最终追求目标的生活方式。有多少文人真正能够奉行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这一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民族、国家、苍生百姓的命运的关切，从来都是衡量中国古代文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要标准。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反过来也决定了文人们对自己的人格追求必然要提出很高的要求。《淮南子》中说，“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也；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悦，不信于友；悦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涎，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这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对于社会作出比较大的贡献，首先就要从自己的道德修养做起，只有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有可能获得名声，进而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作出特殊的贡献。因而，它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伟人。他的伟大，不是在于他留下了多少了不起的著作，实际上孔子一生并没有写下多少东西，他说他是一个“述而不著”的人，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他只引用别人的话来说明道理，自己并不正面直接地阐述他对世事的见解。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唯一的一次从政机会是在鲁国担任很短一段时间的丞相。更多的时候，他匆匆走游于各地，向各国君王讲说他的人生哲学，宣传他的治世之道。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这样做也不能得到多少报酬，促使他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一种使命感，对于人类、对于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所具有的这种精神，也就是他在此后的 2000 年里受到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敬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子在一生中的多数时候都并没有显要的官职，因而也没有人要他非得对社会、对时代负责不可。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上一辈子，教几个学生，对学生讲讲他的想法，谈谈他对人生世事的感触，在那个时代，孔子的学问已经算非常好的了，愿意终身跟他学习的人也有，甚至当他说要“乘桴浮于海”，即要坐着木筏去海外漂泊，也还有学生愿意跟随他去流浪。但是孔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并不以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为生活重心，也远远不止于关心这些自己身边的事情。他的注意力扩展到了整个国家。

关心世事、关心人类的意思并不是说就一定要入仕，要去做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者，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身居的国家是一个有良好的道德气氛的国家，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却过着穷困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一个人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有道德秩序的国家里，他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以此来赢得人们的尊敬，以此来获取他应有的社会地位。相反，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秩序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里，他却获得了很高的社会

地位，他却过着优裕的生活，那么他同样应该受到正常人的轻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却能够过上好生活，能够成为显贵，他一定是个在道德品质上值得怀疑的人。所以孔子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文人，一个优秀的文人应该洁身自好。要不要入世，要不要求富贵，要看社会状况如何，要看这个世界值不值得他去出任政府管理人员。“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意思就是这样。

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把孔子奉为圣人，在生活方式上，在处世方式上也深受孔子思想影响。虽然在中国，人们一般都以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有没有担任显要的职务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却有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他们要坚持另外一种标准，也即道德的标准；用孔子的说法，如果在一个恶劣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中，就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是否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职务，不能用一个文人是否获得了帝王的重用去衡量他的能力和道德水平。在一个有道德秩序的社会里，自我修养和社会地位是可以统一的，而在道德秩序受到破坏的环境里，这两者就很难统一起来。因而，文人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不能去一味地追求高官厚禄，相反，他应该避免因为过分地追求社会地位而失去了自己做人的原则，他只有力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这样会更有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一个优秀的文人，他所最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个人私利，而应该是像孔子那样，时刻关心着整个社会整体上的健康发展。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就是说，一个君子，他的生活最高目的，不是让自己一个人一家人不陷于贫困，而是使整个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君子，他

最忧心的也不是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是整个社会有没有良好的道德秩序。所以，在“邦有道”时，他应该自告奋勇，出来担任重要的社会职务，来向整个社会推行伦理道德；而在“邦无道”时，他既然不可能通过担任重要的社会职务的途径来实现建立道德秩序的目的，既然在“邦无道”的场合担任显要的社会职务必然要为虎作伥，那么他就应该力求以自己的内在道德魅力影响社会，这样他也不失为一个完人，一个优秀的文人，一个称得上“士大夫”的卓越的人。

但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有麻烦之处，那就是国家到底是“有道”还是“无道”，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志。你说“邦无道”，可是人家说“邦有道”，用什么来分辨呢？说到底一个社会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都不能一概而论。孔子在鲁国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相当于丞相的司寇，也不能说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鲁国和当时的整个社会突然就变得“有道”了。那些酷爱功名利禄的伪君子岂不是也可以以“邦有道”来为自己辩护吗？而且真正能够称得上所谓“有道”的理想世界，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很少的，假如文人们真的一旦认为邦“无道”就都拒绝入世，那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无耻文人和社会黑暗了。因此，实际上孔子的话也很难真正实行，只能够把它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原则，或者说是一种信仰。一种虽然很难以做到，却可以向着这一方向努力的最终理想。如果这样看孔子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否从政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何时从政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己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正直的、不为经常变化的世俗偏见所左右的信念。所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只能说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宣言式的生活哲学。关键在于一个

文人，一个士大夫必须在任何环境里都要时时注意保持自己的道德信仰，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真正推崇的道德境界。宋代那位道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这样一篇深受后人称颂的文人道德修养的宣言：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隐！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人矣！”

在这篇文笔优美的短文里，周敦颐以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花卉的爱好为由，表示自己有独特的人生追求。他认为菊花虽好但幽居独处，孤芳自赏；牡丹虽艳，但过于以其富贵荣华而媚俗；只有莲花，虽根陷泥淖却能洁身自好，清高不凡。他说他虽然不能做到像陶渊明那样做一个遗世独立的隐逸者，却想努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像莲花那样生长在污泥中却从不受污染，在清水里涤荡却并不妖冶，香气传得越远越显得清淡高雅，人们可以从远处观赏，却不能在近处玩弄。他虽然达不到爱菊的陶渊明那样淡泊名利的境界，却也不愿像牡丹那样，因其富贵而受到一般人的亲睐，得到世俗人的喜欢。这也就是说他那种既不求媚于人，也不攀附权贵，性格刚直不阿，思想纯正通达，独持操守的人生追求，不是为了获得世人的称颂，而是为了一己的道德修养。《红楼梦》里写到林黛玉时，也把这位清高孤傲、不入俗流的小姐比做“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这也是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特有的价值标准来夸赞她的品格，指出她虽然并没有出世，却也没有

被世俗的思想观念所俘虏。

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为后代文人树立了一个极高的生活准则，所以孔子说“任重而道远”。他标举一种把“道”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哲学，这个“道”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很难达到，但是后代无数的精神追随者们却也在努力地尽可能接近这一标准。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这“任”才称得上“重”，要完成这一重任，文人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努力的，在某些时候，他可以去担任社会要职，通过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实现理想；在另一些时候，他也可以拒绝从政，只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作为世人的榜样，来影响世人，以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孔子为后人指出了这样两条表示对国家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途径，而 2000 年来孔子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个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典型。

稷下之学，不治而议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独特价值观念形成的初期。在这个时期，“士”还没有完全从“庶人”阶层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许多文人渐渐地意识到文化的价值，意识到文化人应该有一种尊严感，而不能满足于仅仅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在这以前的文化人则不是这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最为典型的用世文人要数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和苏秦。他们靠

一副伶牙利齿，说动各国统治者，虽然也都历尽千难万险，毕竟都受到了重用。尤其是苏秦，传说他曾因伐秦有功而被齐、赵、韩、楚、燕、魏六国拜为丞相，可以说已经是极人臣之最了。后代关于苏秦的传说颇具传奇色彩。据说苏秦家原有兄弟二人，老大是个财主，家里堆金积玉，良田万顷；苏秦是老二，是个寒儒，箪瓢陋巷，穷无所倚，虽然学富五车，却受人轻视。用中国传统的伦理至上的模式来描述，苏秦所受到的轻视主要是来自他的兄嫂和父母。苏秦后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重用，是因为他不愿意甘于贫困，不愿接受“满腹文章不疗饥”，“自古儒冠多误身”的不公平的命运，他在第一次向秦国献策受到挫折后更是悬梁刺股发愤读书，终于以才学，其实主要是靠他的口才打动了当时的各国统治者，实现了他治世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文人群体，一开始只是像张仪苏秦这样渴望为统治者所用，通过这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他们却很快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那就是当统治者不听他的劝告，不采纳他的治国方略时，他就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纯粹被动的境地。这就是说，如果文人要靠统治者的任用才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那么哪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也只有很少的一点自由——选择主人的自由。他的人生价值还是不能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不能真正通过文化上的追求实现。设想像苏秦那样悬梁刺股刻苦攻读，他应该有很好的学识了，而且他也已经有了非同一般的才能，但是如果他不是得到了魏王的重用，他也还是一个时时受人轻视的一介寒儒。这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仅仅有文化还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把他的文化学识献给国家的统治者；一个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